

LIANGQICHAO LUN XIANQIN ZHENGZHI SIXIANGSHI



梁启超论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启超 著

梁启超论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启超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序

启超治中国政治思想，盖在二十年前，于所为《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常作断片的发表，虽大致无以甚异于今日之所怀，然粗疏偏宕，恒所弗免。今春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之招，讲先秦政治思想，四次而毕，略赅前绪而已；秋冬间，讲席移秣陵，为东南大学及法政专门讲此本，讲义且讲且编，起十月二十三日，迄十二月二十日，凡两阅月，成，初题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分序论、前论、本论、后论之四部，其后论则自汉迄今也，中途婴小极，医者谓心藏病初起，既有征矣，宜辍讲且省思虑，不则将增剧而难治。自念斯讲既已始业，终不能戛然遽止，使学子舛望，卒黽勉成之，幸病尚不增，能将本论之部编讲完竣，其后论只得俟诸异日矣。因所讲仍至先秦而止，故改题今名，启超讲述斯稿之两月间，以余力从欧阳竟无先生学大乘法相宗之教理；又值德人杜里舒博士同在金陵讲学，而张君励董其译事，因与君励同居，日夕上下其议论。兹二事者，皆足以牖吾之灵而坚其所以自信，还治所业，乃益感叹吾先哲之教之所以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其气象为不可及也。书成后，徐志摩拟译为英文，刘文岛及其夫人廖世劭女士拟译为法文，倘足以药现代时敝于万一，斯则启超所以报先哲之恩我也已。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梁启超自序于南京成贤学舍。

目 录

序 论	1
第一章 本问题之价值	3
第二章 问题之内容及资料	10
第三章 研究法及本书研究之范围	14
前 论	19
第一章 时代背景及研究资料	21
第二章 天道的思想	25
第三章 民本的思想	36
第四章 政治与伦理之结合	44
第五章 封建及其所生结果	49
第六章 阶级制度兴替状况	52
第七章 法律之起原及观念	55
第八章 经济状况之部分的推想	61

本 论	69
第一章 时代背景及思潮渊源	71
第二章 政治思想四大潮流及研究资料	76
第三章 儒家思想(其一)	80
第四章 儒家思想(其二)	88
第五章 儒家思想(其三)	93
第六章 儒家思想(其四)(孟子)	101
第七章 儒家思想(其五)(荀子)	111
第八章 道家思想(其一)	120
第九章 道家思想(其二)	133
第十章 墨家思想(其一)	141
第十一章 墨家思想(其二)	146
第十二章 墨家思想(其三)	155
第十三章 法家思想(其一)	163
第十四章 法家思想(其二)	169
第十五章 法家思想(其三)	177
第十六章 法家思想(其四)	184
第十七章 统一运动	192
第十八章 寝兵运动	196
第十九章 教育问题	200
第二十章 生计问题	207

第二十一章 乡治问题	219
第二十二章 民权问题	223
第二十三章 结论	229
 附录 先秦政治思想	 232

(据《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13 册改排)

序 论

第一章 本问题之价值

人类全体文化，从初发育之日起截至西历十五六世纪以前，我国所产者，视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无逊色。虽然，我国文化发展之途径，与世界任何部分，皆殊其趋。故如希伯来人、印度人之超现世的热烈宗教观念，我无有也；如希腊人、日耳曼人之瞑想的形而上学，我虽有之而不昌；如近代欧洲之纯客观的科学，我益微微不足道。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坐是之故，吾国人对于此方面诸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吾国人参列世界文化博览会之出品恃此。

人生哲学，不在本讲义范围中，且置勿论，专言政治哲学，我国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而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其政治思想有大特色三：曰世界主义，曰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曰社会主义，此三种主义之内容，与现代欧美人所倡导者为同为异，孰优孰劣，此属别问题。要之此三种主义，为我国人夙所信仰，无论何时代何派别之学者，其论旨皆建设于此基础之上。此三种主义，虽不敢谓为我国人所单独发明，然而最少亦必为率

先发明者之一。此吾所不惮昌言也。

欧洲自十四五世纪以来，国家主义萌茁发展，直至今次世界大战前后遂臻全盛。彼所谓国家主义者何物耶？欧洲国家，以古代的市府及中世的堡聚为其雏型。

罗素所著爱国功过一书，言“英国人惯用仇嫉外国的卑劣手段，以奖励其国民爱国心。最初仇西班牙人，继则仇法国人，继则仇德国人，今后又不知当仇谁氏。”此言深可味。

一切政治论，皆孕育于此种市府式或堡聚式的组织之下。此种组织，以向内团结、向外对抗为根本精神。其极也，遂至以仇嫉外人为奖励爱国冲动之唯一手段。国家主义之苗，常利用人类交相妒恶之感情以灌概之，而日趋蕃硕。故愈发达而现代社会机隍不安之象乃愈

其所谓天下者，是否即天下且勿论，要之其着眼恒在当时意识所及之全人类。

著。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乎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政治之为物，绝不认为专为全人类中某一区域某一部分人之利益而存在。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故向内之特别团结，亦不甚感其必要。就此点论，谓中国人不好组织国家也可，谓其不能组织国家也可。无论为不好或不能，要之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则甚章章也。此种“反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的政治论既深入人心，政治实况当然受其影响。以二千年来历史校之，得失盖参半。常被异族蹂躏，是其失也，蹂躏我者非久便同化，是其得也。最后总决算，所得优足偿所失而有余。盖其结果常增加“中国人”之组成分子，而其所谓“天下”之内容，日益扩大也。欧洲迄今大小数十国，而我国久已成为一体，盖此之由。虽然，此在过去为然耳，降及近世，而怀抱此种

观念之中国人，遂一败涂地。盖吾人与世界全人类相接触，不过在最近百数十年间，而此百数十年乃正国家主义当阳称尊之唯一时代。吾人逆潮以泳，几灭顶焉。吾人当创巨痛深之余，曷尝不窃窃致怨于先民之诒我感。然而平陂往复，理有固然。自今以往，凡畴昔当阳称尊之学说，皆待一一鞠讯之后而新赋予以评价。此千年间潦倒沉沦之超国家主义——即平天下主义、世界主义、非向外妒恶对抗主义——在全人类文化中应占何等位置，正未易言。

平等与自由，为近世欧洲政论界最有价值之两大产物。中国在数千年专制政体之下，宜若与此两义者绝相远。然而按诸实际，殊不尔尔，除却元首一人以外，一切人在法律之下皆应平等。公权私权皆为无差别的享用，乃至元首地位，亦不认为先天特权，而常以人民所归向所安习为条件，此种理想，吾先民二千年前，夙所倡导，久已深入人心，公认为天经地义。事实上确亦日日向此大理想进行，演成政治原则，莫之敢犯。其最显著者，则欧美贵族平民奴隶等阶级制度，直至近百年来始次第扑灭。其余烬之一部分，迄今犹在。我国则此种秕制，已成二千年彊石。欧人所谓“人权”，全由阶级斗争产来。其得之也艰，故其爱护之也力。我国则反是，斯固然矣。然必有阶级然后有斗争之主体。在久无阶级之我国，兹事自不能成问题，且以学理衡之，吾侪亦不能认阶级斗争为性质上可崇敬之事业。若果尔者，一切阶级灭尽之后，人类政治岂不日陷于堕落耶？我国历史上未闻有此等惨酷之斗争，而已得有相当的人权，纵不必自豪，亦未足云辱也。所以能尔者，则以人类平等观念，久已成为公共信条，虽有强者，莫敢屡撓也。

自由与干涉对待，政治上干涉主义之利病，在我国先秦时代，实为学界争论最剧之问题。结果不干涉主义，殆占全胜。此主义

以不可抗的权威，常临乎历代君相之上。故秦汉以降，我国一般人民所享自由权，比诸法国大革命以前之欧洲人，殆远过之。事实具在，不可诬也。其间昏主淫威，墨史骖法，致自由失所保障者，史固不绝书。然吏之毒民，非法律所许，民本有控诉之余地。至对于暴君，则自昔圣贤，皆认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在学理上未尝少为假借也。我国民惟数千年生活于此种比较的自由空气之中，故虽在乱离时，而其个性之自动的发展，尚不致大受戕贼。民族所以能永存而向上，盖此之由。

美林肯之言政治也，标三介词以括之曰：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译言政为民政，政以为民，政由民出也。

中国未受工业革命之影响，故分配以惰力而保平均，似不能持以与今代欧美比较，然中国百年前之经济组织，与欧洲百年前亦迥不同，我则一向皆常能保均富而抑兼并，此根本特色也。

我国学说，于 Of, For 之义，盖详哉言之，独于 By 义则概乎未之有闻。申言之，则国为人民公共之国，为人民共同利益故乃有政治。此二义者，我先民见之甚明，信之甚笃。惟一切政治当由人民施行，则我先民非惟未尝研究其方法，抑似并未承认此理论，夫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以外，此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为效几何？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毋乃在是？虽然，所谓政由民出者，不难于其理论也而难于其方法？希腊诸市之全民会议，遂得谓为真 By the people 耶？近世诸国通行之代表制多数取决制，乃至最近试验之苏维埃制，又得谓为真 By the people 耶？皆不容无疑，然则实现 By the people 主义之方法，虽在欧美今日，犹不能作圆满解答，况我国过去之国情——因地理及其他关系所产生之社会组织——多不适于此类

方法之试验。既不能得有可恃之方法,则不敢轻为理论的主张,亦固其所。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理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欧美人睹中华民国猝然成立,辄疑为无源之水,非知言也。

文化演进较深之国,政治问题必以国民生计为中心,此通义也。我国盖自春秋以前,已注重此点。“既富方谷”、“资富能训”诸义,群经既所屡言。后此诸家政论,罔不致谨于是。而其最大特色,则我国之生计学说,常以分配论为首位,而生产论乃在次位也。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倡导在近百余年间耳。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在此主义之下,而实行方法大相迳庭,亦与现代社会社会主义之派别多歧者略相似。汉唐以降之实际的政治,其为人所称道者,又大抵皆含有社会政策之精神,而常以裁抑豪强兼并为职志者也。故全国人在比较的平等组织及条件之下以遂其生计之发展,世界古今诸国中,盖罕能与我并者。此虽半由环境所构成,抑亦学说之入人深也。

窃尝论之,中国文明,产生于大平原。其民族器度伟大,有广纳众流之概。故极平实与极诡异之学说,同时并起,能并育而不相害。其人又极富于弹性性,许多表面上不相容之理论及制度,能巧于运用,调和焉以冶诸一炉。此种国民所产之思想及其思想所陶铸而成之国民意识,无论其长短得失如何,要之在全人类文化中,自有其不朽之位置。可断言也,夫绝对的真理之有无,学者久已疑之,理论上且有然。若夫理论之演为制度者,其是非盖益幻赜而不易究诘。欧洲近一二百年,政治学说、生计学说之标新领

异，几使人应接不暇。种种学说，亦泰半已经次第实现以成制度。然每一主义之昌，未尝不有极大之流弊踵乎其后，

至今日则其人深陷于怀疑恼闷之渊。举凡前此所安习之制度，悉根本摇动。欲舍其旧而新是谋，则皇

中国国民性之短处亦自有之，如好调和以致不彻底，即其一也。此非本论范围，故不多及。

皇然若求亡子而未得也。我先民所诒我之思想，虽或未成熟，或久中断，搜剔而磨洗之，又安见不龟手之药终无益于人国也。由此言之，本问题之价值可以见矣。

平心论之，价值之为物，本非绝对的不变的。吾侪殊不必妄自尊大，谓吾所有者必有以愈于人，更不宜讳疾忌医，掩护其所短以自窒进步。但尤有一义当知者，本国人对于本国政治思想，不惟其优良者有研究

业字为佛教术语，个人遗传性谓之别业，社会遗传性谓之共业。

价值，即其窳劣者亦有研究价值。盖现代社会，本由多世遗传共业所构成。此种共业之集积完成，半缘制度，半缘思想，而思想又为制度之源泉。过去思想，常以历史的无上权威无形中支配现代人，以形成所谓国民意识者。政治及其他一切设施，非通过国民意识之一关，断不能有效。质言之，非民众积极的要求或消极的承诺之政治，则不能一日存在。近二十年来，我国人汲汲于移植欧洲政治制度，一制度不效，又顾而之他，若立宪，若共和，若联邦，若苏维埃……凡人所曾行者，几欲一一取而试验之。然而名实相缪，治丝愈棼，盖制度不植基于国民意识之上，譬犹掇邻圃之繁花，施吾家之老干，其不能荣育宜也。最近穷而思返，先觉者始揭改造思想之旗以相号召，虽然，改造云者不惟其破坏也而惟其建设，欲革去一旧思想，必须有一新思想焉足膺人心者以代之，否

则全社会陷于怀疑与虚无,结果仍让彼有传统的惰力之旧思想占优势耳。而新思想建设之大业——据吾所确信者,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潜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信如是也,则我国过去政治思想,虽其中一部分对于世界无甚价值者,就吾国人立脚点言之,其价值不可蔑视明矣。

积极要求者,以国民意识积极的作用创造一种新组织也,例如法国之“人权宣言”为十九世纪民权国家成立之总发动机。消极承诺者,以国民意识消极的作用,维持一种旧组织者也,例如日本今尚戴万世一系之天皇,中国人民默许藩镇割据。

第二章 问题之内容及资料

政治思想之内容,从所表现的对象观察,可分为二类:一曰纯理,二曰应用。纯理者,从理论上悬一至善之鹄,研究国家当用何种组织,施政当采何种方针……等等。应用者,从实际上校其效率,研究某种组织某种方针……等等如何始能实现。此两者虽有区别,然常为连锁的关系。纯理必借应用而始圆满,应用必以纯理为其基据。

从能表现之主格观察,亦可分为二类:一曰个人的思想,二曰时代的思想。个人的思想,为大学者或大政治家脑力所产物,其性质为有意识的创造;时代的思想,由遗传共业及社会现行习俗制度混织而成,其性质为无意识的演进。两者亦常有交光的关系,个人能开拓时代,时代亦孕育个人。

吾侪欲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其资料当求诸何处耶?以吾所见,区为四类。

第一类,学者之著述及言论。此为个人创造力之完全表现,例如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尹文、孟子、荀卿、韩非、贾谊、董仲舒、仲长统、桓宽、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郑樵、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戴震、谭嗣同等,皆有著述传后。吾侪将其著述爬梳整理,可以察其思想之脉络焉。此外或无著述或

虽有而已佚者，则从别人所征引彼之言论以窥其思想之一斑。此惟先秦时代为较多，例如邓析思想，见于《吕氏春秋》；许行思想，见于《孟子》；惠施思想，见于《庄子》；宋钘思想，见于《孟子》、《荀子》之类是也。

第二类，政治家活动之遗迹。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不同，哲学思想为学者所独有，其发表之形式专恃著述，政治思想什九与实际问题相接触，一有机会，则不惟坐而言，直将起而行。故凡属有主张有设施之政治家，例如周公、管仲、子产、孔子、商鞅、李斯、汉高祖、汉武帝、王莽、诸葛亮、崔浩、苏绰、唐太宗、刘晏、陆贽、王安石、明太祖、张居正、清圣祖、曾国藩之流，无论其人为贤为不肖，其事业为成为败，要之其关于政治上之设施，皆其思想之现于实者也，故此等人之传记，实斯学主要资料之一种。

第三类，法典及其他制度。政治思想之实现，恒结晶以变为成文之法典及其他单行制度，例如周官、法经、汉律、汉官、唐律、唐开元礼、元典章、明会典、清律例、清会典乃至如通典、文献通考等类之政书，与夫历代诏令奏议，凡此类法制之书，虽大半递相沿袭，而其间有所损益，恒必与其时代之要求相应，此即彼时代政治思想之表现也。至于立法时赞成反对之意见表于言论者，尤足为时代思想之徽帜，自无待言。

第四类，历史及其他著述之可以证察时代背景及时代意识者，凡思想皆应时代之要求而发生，不察其过去及当时之社会状况，则无以见思想之来源。凡一思想之传播，影响必及于社会，不察其后此之社会状况，则无以定思想之评价。故欲治政治思想史，必须对于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风俗